

近代史学研究

主持人语

“近代史学研究”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出自参与2012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合办的学术会议,由两校师生共同组织。德国的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教授和北大的欧阳哲生教授负责,共同发表论文。这三篇文章处理的主题各有不同,但又有共同性,那就是讨论在1840年开埠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如何产生一系列的变动和改革。刘会文的孟森研究,从个案出发,仔细铺陈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中,长期执教北大的孟森,其治史理念如何产生不断变化,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所经历的深刻变迁。王晴佳的论文,异曲同工,也讨论中国史学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产生的变化。他的着眼点是历史教科书的写作所引起的史学写作体裁的变更以及与日本近代史学的关联。他的论点是,中国近代史家走出纪传体、编年体的传统,不但因应了当时民族史学写作的需要,也彻底更改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为进化论的普及开辟了道路。郁汉友(Hajo Frölich)的论文,亦从清末的教育改革入手,讨论了清朝“新政”的相关内容,并对其历史地位提出了新见。他的研究重点有关广东新式学堂的建立,但又以小见大,提出“新政”虽然是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孤注一掷,其后果却影响深远,并不能一笔抹杀。他的发现是,为了推广新式教育,清政府推行了新型的统计制度,让各级政府提供详细的数据,以便集中管理。这一做法在当时成效不大,却为以后的政府建设打下了基础。总之,中国近代文化的变化,不但规模巨大、影响深远,而且原因错综复杂,不仅有来自域外的冲击,更有政府与地方、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组文章的发表,希望能抛砖引玉,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王晴佳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 ——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王晴佳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关键词: 进化论; 纪传体; 章节体; 中国史学; 日本史学

中图分类号: K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1-0104-11

收稿日期: 2013-09-05

作者简介: 王晴佳,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

此文系笔者参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中日关系的多重面向”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中国的历史记载传统,源远流长,举世闻名。汉代史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的《史记》,为这一传统的诞生和延续起了一个奠基的作用,历代为人所称道。毋庸赘言,司马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记载体裁,后经班固略加修整,为中国历史著述、特别是以后被称作“正史”的朝代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这一纪传体的模式,一直是历朝官方史家修史的主要体裁。或许是这个原因,虽然司马迁的时代距今甚远,但当代的史学史研究者,仍然对司马迁的治史及其《史记》的写作,倍加称颂,鲜有微词。^①不过有趣的是,当代中国史家,又几乎没有人继续采用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来写作历史。相反,他们采用的历史写作体裁,无一例外的是所谓的“章节体”,即用叙述的手法,将人和事整合在一起,按时代顺序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又按内容需要,分章分节,加以描述和分析。易言之,当代的中国史学,有一种既称赞司马迁但又不学司马迁的一个堪称吊诡的现象。本文的写作,就是想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及其背景和原因,尝试做一分析和解答,与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和同行交流、切磋。

一

司马迁的纪传体,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体裁适应了当时官方修史的需要。司马迁纪传体的结构,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这一结构,以前三者为主要,因为司马迁的著述,是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因此他将人的活动,按当事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分别列入“本纪”“世家”和“列传”。换言之,如果当今史家继续采用纪传体来写作历史,那么他们必须也照此办理,将书中所处理的各种人物,按其等级和地位置入不同的范畴。如此做法,与时代发展显然不符。比如民国以

后,君主帝王已经不再主宰中国的政坛,因此“本纪”的写作也就失去了内容。由此可见,纪传体的被淘汰,或许顺理成章。当然,司马迁的伟大,抑或是他至今为人所称道的一个地方就是,虽然他创造了按等级描述人物活动的体例,但他的具体做法,又常常违背了这一体例。譬如《史记》中有“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将一个未成帝业的项羽和一个聚众造反的陈涉,给予了特殊的、超常的地位,展现的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个人的好恶和独特看法。不过,这些只是纪传体采用的一些特例。而在司马迁之后,纪传体的运用就变得十分拘谨(严肃?),这种超乎寻常的举动,已经很少出现了。

讨论司马迁纪传体的优劣,并非本文的主旨。上述议论,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历史著述与时代变迁、也即历史变动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章节体”体裁的出现和普及,所以也必须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如同上述,王朝帝国在中国政坛上之消失,使得纪传体的写作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但饶有趣味的是,在清朝灭亡以后,纪传体的史书,还有编撰,比如民国初年所编的《清史稿》,而章节体史书则在清末便开始出现了。所以历史变动和史书编撰之间,自然存在有机的联系,可同时也要注意,这种联系并非机械呆板的,而是常常有超前、滞后和并行的情形出现。

纪传体虽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主体,但在这之外,中国史家还尝试和创造了不同的记载历史的方式。比如编年史的撰写,与纪传体至少一样古老,又在宋代经司马光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而重现其光彩。此外,中国史学还有纪事本末体、杂史和方志等不同记载历史中的人事活动的体裁。因此,纪传体的史书,或许从来就不能代表中国史学的全部。顺便说一句,西方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往往会以偏概全,用纪传体的朝代史,来概括

^① 仅举一例,杜维运先生治史学史多年,其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堪称杰作。杜先生对司马迁的评价尤高:“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史记在中国历史上,如日月丽天,像永不枯萎的青松,历万古而长新。它的问世,创造了中外史学的新世纪”。氏著《中国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册,第158—159页。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① 但与传统史学写作体裁的相对多样化相比,当代中国史家的著述,如同上述,则几乎均以章节体为基本样式。^② 这一现象,史无前例,值得探究,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基本动机。

其实,史家选取甚至创造何种体裁记载、写作历史,既有传统的影响,也有现实的需要,更与历史观念相关。中国近现代史家选择章节体写作历史,反映出一种近代史观的显著变化。而孕育这一变化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契机,则在清季便已出现。比如在清朝学问中,边疆史地的研究,在19世纪初年异军突起,便反映了当时士人对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警惕。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开明人士如林则徐编写《四洲志》和魏源写作《海国图志》,都没有采用纪传体或编年体这样的体裁,而是转用“志”“书”的形式,综合描述所获知的信息和知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志”和“书”这样的著述范畴,与西方学问中的“专题研究”相类,所以近代西方史家翻译司马迁、班固的著作时,也用“monograph”来称呼和对应“志”和“书”。现在西方的大部分论著,均属 monograph,也即专题论述。^③ 由此看来,清季的史家,已经看到在描述世界历史的时候,无法用纪传体这样的方式将各个国家分门别类的处理。^④ 顺便提一下,日本近代史家冈本监辅(1839—1904)是帮助日本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其所著《万国史记》(初版于1878年)是日本人最早写的世界史之一,以后传入中国也有不小的影响。不过该书虽然冠以“史记”之名,但其结构,却没有“本纪”“世家”和“列传”之分,只是各国的纪传(如“英

吉利记”“法兰西记”等),也即国别史。冈本写这些纪传,将人和事都综合一起,加以一并叙述。^⑤ 这些例子都说明,东方与西方文明在近代开始产生互动以后,东亚史家已经开始觉得无法用已有的“正统”方式理解和解释世界了。这里表现出的,既是世界观、也是历史观的重要变化。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权开始寻求变法和中兴,其标志之一就是不再阻挠中西文化和宗教的交流。西方传教士由此而进入中国,其传教活动不但形式多样,而且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部分中国士人也慢慢改变了原来保守的态度,转而关注西方文化。官方同文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和传教士之办报和译书,都让中国人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文化和学术。就历史学而言,西方人所著的历史著作,也渐渐落入中国士人的眼帘。譬如英国史家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一部本来平庸的《十九世纪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和中国士人蔡尔康协同翻译,以《泰西新史揽要》在中国问世,一时洛阳纸贵,颇为畅销。此书从体裁到内容,以西方近代史学着眼,并非所称的“新史”,但就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情形而言,则有助中国读者接触到西人著史的形式和内容。简言之,传教士所译的西方史书,让中国读者初识章节体的史书体裁。除了《泰西新史揽要》之外,其他西方人的历史著作,在当时也有翻译出版的。譬如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 1841—1913)就有《万国通鉴》一书,由他自己用浅白的中文编写,也在

① 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便声称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是“由官吏为官吏而写”,引自W. G. Beasley, E. G. Pulleyblank,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5.

②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先生领衔主持的92卷本《清史》的编撰,对使用何种体裁,做出了不少探索,并最终决定采用改良的纪传体体裁,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部分进行编纂,此举或许是一个例外。

③ 英文词典大都将“monograph”定义为对一个单独的题目或一个题目的某一方面所写出的论著。

④ 陈启泰在《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驢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中指出,清代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历史写作的新体裁,逐步走向章节体(他称之为“新综合体”)。

⑤ 《万国史记》的出版,在当时受到不少重视,日本汉学家中村正直、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为之作序,其中重野安绎就指出,冈本的写作体裁,是一种国别史。见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卷一,重野安绎“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1879年版,第5—8页。

那时出版,其中有“东方国度”四章,涉及了中国历史。但这些西人编写的章节体史书,虽然让中国人看到历史著述的另一种方式,但因为处理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谢书还有浓厚的传教意识和宗教内容),因此其冲击力和震撼力相对不是很大。所谓“相对不是很大”,我指的是对史家著史的启发,也即中国史家是否感到有必要模仿和接受这一体裁来写作中国历史的程度而言。^①

《泰西新史揽要》在1894年的《万国公报》上连载,翌年又单独出版。而1894年正是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其重要性就在于中日关系在次年的战争中由于清朝的战败,产生了巨变。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全盘西化,成为亚洲的强国。中国朝野和士人为之震惊,中国知识界受到震撼。而其结果,便是刺激不少中国学人到日本求学,探究日本转型成功的奥秘。由此契机,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

二

如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日本近代史学在明治初年的演化历程。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前二十年,虽然可用“全盘西化”来形容,但就具体而言,似乎非其原意,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就拿明治维新而言,革新派人士用“维新”来形容他们的事业,或许表明他们的企图,只是革新,而不是革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们显然想保留和维护这个“旧邦”的。这一点在明治初年,政府对待修史的态度,就能明显看出。明治维新的第二年,也即1869年,新政府就成立了以编纂历史为目的的官方史学机构,其使命是“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纲常”。这些目的,与中国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以官方名义为前代修一部正史,并

无二致,甚至遣词造句,都十分类似。的确,当时明治政府给予其官方史家的任务,就是编纂一部《大日本编年史》,以征集、考订史料为目的。这一任务,与中国王朝史家编纂实录(一般采用编年体)相仿,而在帝制时代的中国,编写实录,是为写作纪传体的正史做准备。

但那时的日本,毕竟已经时过境迁,无法与帝制时代的中国同日而语。虽然修史是日本天皇的命令,可是欧风美雨却日益强劲。修史馆的史家如重野安绎(1827—1910),也感受到照旧法修史,已经与时代的变化不符。而他的同事久米邦武(1839—1931),更是岩仓使节团的成员之一,对欧美各国进行过长达两年的访问。他们都对西方人的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出重金请人撰写翻译西方史家的著作。明治政府也改变了主意,聘请了德国年仅26岁的学者、曾受著名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指导并担任其誊写员的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于1887年到东京大学任教,希图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②次年,重野安绎、久米邦武和星野恒(1839—1917)等修史馆成员将修史馆并入东京大学,他们亦成为文学院的历史教授。最后,修史馆放弃了编纂《大日本编年史》的任务,而是由他们用新式的、章节体的手法,合力编纂了《稿本国史眼》一书,共七卷,于1890年开始出版。

重野安绎为《稿本国史眼》一书写了简短的序言,解释了写作该书的意图。他用“史眼如炬”开头,说到史家的任务,就是用好的眼光,就“时势变迁,制度沿革,风俗文物等,摘抉其要”,以示后世。易言之,他指出了《国史眼》此书与传统体裁的不同。的确,虽然《国史眼》在起始展示了一个“天皇继统表”,在每一个天皇下面做一简略的

① 邹振环撰文指出,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书名有不同的译法,也有不同的版本。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论,谢书在当时中国流行并不太广。邹也认为,清末中国人接受西方章节体的历史写作形式,与日本的教科书关系更大。见氏著《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邹的论点延续了周予同先生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出版)的看法,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4页。

② John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8, pp. 73—80.

介绍。其后的编排,则从“卷”到“纪”,“纪”下面则是“章”,虽然名称不同,但却明显看出是章节体的格式。《国史眼》的内容,按时代顺序安排,每一卷和每一纪,都用一标题标示其主要内容,如第六卷写的是德川家康的时代,共分三纪,第十九纪冠以“德川氏初世”、第二十纪“德川氏中世”和第二十一纪“德川氏季世”,然后每一纪下面又有几章(无明确标题,直接进入叙述)。这些分期方法,似乎是为了显示作者作为史家“如炬的眼光”。^①这种写法,与西方史学中常见的叙述体裁,有不少相似之处,表明重野安绎等明治时代的“旧学者”,其学问已经渐渐地跟上了那时已经西化了的时代。与此相比,清末民初的中国官方史家如赵尔巽、缪荃孙、柯绍忞等人,尚无意革新传统史学的方式。他们主持的《清史稿》的编纂,其体例基本沿用了《明史》。

我们称重野安绎为“旧学者”(其实更精确的叫法是“汉学者”,因为他们均治汉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是因为在他们之外,日本还有更为西化的人物,那就是以福泽谕吉(1835—1901)和田口卯吉(1855—1905)为代表的“文明史家”。家永三郎等日本史家指出,日本史学的近代化,出现了双轨齐下的现象,即既有官方史家革新史学的举动,又有新闻界、知识界人士涉足史学,推动史学改革的成绩。^②有关日本近代的“文明史学”,笔者曾撰有论文,其他学者也多有论述,此处不再多说。^③福泽谕吉基本上是一位思想家,但他作为日本近代启蒙运动领袖的地位,却又是与他提倡改造传统历史观念的论著分不开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原来尊奉中华文明到认可西方文明在近代的领先地位,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福泽谕吉的年轻追随者田口卯吉,对近代日本史

学,比较福泽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因为田口不仅撰有名噪一时的《日本开化小史》,用章节体的形式叙述日本的通史,而且还主编《史海》的杂志,推动新式历史撰写的体裁。在《史海》上发表论文的,也有不少学院史家。总结一下近代日本史学的双轨发展,我们能得到的结论就是,在1894年中日开战的年代,日本史家写作历史的形式,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第一是历史写作形式的变化。德川时代的日本史学,以卷帙浩繁的《大日本史》为典型,而《大日本史》的体裁,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但到了19世纪晚期,无论是官方史家(后来是学院史家)的论著,还是学院墙外的“新闻史家”抑或“文明史家”笔下的史学作品,大都转向了叙述史学,用章节体的形式描述历史的演化。第二是历史写作内容的扩大,史家不再以天皇和皇室的活动为中心,也较少强调史学的道德训诲作用,而是希图勾勒日本“社会”和“人心”的演进和变化。为此目的,他们关注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并将之与政治制度的变革糅合在一起描述。第三则是通贯的视角。无论篇幅多小,作者都希求对日本的历史,做一从头至尾的叙述,几乎不见中国传统朝代史和日本以前《六国史》的影响。

这第三个特点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史学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国史眼》,基本都是为教学所用的。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与其教育和学制的近代化,同步相连。其中的原因,显然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所阐述的观念有关。福泽谕吉指出,世界上的文明以西方为最先进,东亚文明次之,被他称为“半开化”。而个中原因,就是因为东亚虽然代有贤人,但“民智”开发不够,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平与精英相比,差之甚远。

① 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编著《稿本国史眼》卷一,序言及卷六,东京:大成馆1890年版。

②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日本の近代史学》,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7年版,第67页以降。

③ 参见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第191—236页。此文修改后译成日文发表,题为《明治期日本史学と清朝末期における新スタイルの歴史教科書》,收入近藤孝弘编《東アジアの歴史政策:日中韓対話と歴史認識》,东京:明石书店2008年版,第132—155页。李孝迁所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文明史学”之进入中国,专门辟有一章,见第42—83页。另见张昭军《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梁启超、田口卯吉为重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大力开发民智,对民众进行启蒙,学制改革就势在必行。明治初期的政策,见于一些口号,如“富国强兵”之类,类似的说法在清季中国也能见到。但明治日本还有一个口号是“文明开化”,显现出明治政府已经决意向西方学习,这在强调“中体西用”的清代中国未受特别重视。所谓“文明、开化”,其实就是英语“civilisation”的两种不同译法而已。^①而根据牛津英语词典,“civilisation”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社会发展和组织的一个发达的阶段”。这一个解释符合了福泽谕吉的理解,那就是文明的发展,仰赖社会整体的进步,而社会的整体进步,必须普及教育。明治政府成立甫初,在全国推行小学义务教育,造成教科书的需求大增。就历史教科书而言,近代日本的许多史家,都曾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由日本文部省认定的最早的一本近代历史教科书《史略》,发行于1872年,共有四卷,其第一卷《皇国》和第二卷《支那》,由当时任职于修史馆的木村正辞(1827—1913)撰写。而木村正辞本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后任东京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上面提到的日本汉学家重野安绎,不但参与编写《国史眼》,而且也作为当时不少历史教科书作序。

因此,自明治初期以来,日本便有学者、教授编写教科书的传统,可见普及教育在当时所受到的高度重视。这一传统至少带来两个便利,第一是由学者参与编写教科书,他们也会比较有意识地不断探索教科书写作的新途径,第二是教科书的写作的内容和体裁,能直接反映日本史学界的变化。譬如收入于海后宗臣所编的《日本教科书大系·近代编》的历史教科书,就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明治以来历史教科书的不断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线索,就是逐渐摆脱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编撰

传统,而融入叙述体的成分。比如椿时中所编的《小学国史纪事本末》,出版于1882年。从它的名称可以看出,作者试图用袁枢所创的纪事本末体来叙述日本历史的大事。这一尝试,可以说是日本史家正式采用西方叙述体史书写作的前奏,因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体裁中,纪事本末体融人事为一体,又“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章学诚语)被梁启超视为最接近近代叙述体的一种体裁。^②另外,有些教科书作者编写了几本不同的教科书,对教科书的体裁逐渐加以改进。譬如上面提到的木村正辞,在1877年编写《国史案》时,就开始对日本史做了比较明确的分期,将之分为“上古之史”“中古之史”和“近代之史”,稍微摆脱了一点以皇位更替为主线的撰写模式。^③

1880年代又是见证日本史学建制改革的时期。明治前二十年,日本朝野一味学习西方,鄙视其亚洲的邻居,特别是中国。这从他们对中国的称呼可以看出来一斑。在明治以前,日本人一般称呼中国为“中土”或“汉土”,在清代则称“清国”。但明治以后,便改称中国为“支那”,音译了拉丁语的“Sina”一词。“支那”一词本身没有什么贬义,但这一改称,则可见日本人对中国态度在近代的转变。以后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用“支那人”乃至“支那猪”的叫法,直到二战以后才逐步放弃“支那”这个称呼。明治日本既然鄙视中国,对中国历史也缺少重视。有关中国的历史知识,除了上面提到的木村正辞所编的《史略》中有一卷,大都来自元代曾先之编写、明代传入日本的《十八史略》一书。其实《史略》一书的书名,也受到了《十八史略》的启发,而在那个时代,用“史略”来命名的历史书,数量众多,可见《十八史略》在日本影响之大。^④不过在1880年代的中期,已经有

① 小沢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編:19世紀日本啓蒙史学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版,第104—122页。

② 梁启超亦言“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步之极轨也”。氏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椿时中的书收入海后宗臣、仲新编《日本教科书大系·近代编》第18卷,东京:讲谈社1961—1967年出版。

③ 木村正辞《国史案》,东京:文部省印行1877年版。

④ 参见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日本汉学家开始沿用他们写作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新方法,写作有关中国历史的史书。如以《日本开化小史》闻名的田口卯吉,在1883年如法炮制,出版了《支那开化小史》。1888年,汉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开始写作《支那通史》,以后又有市村瓚次郎(1864—1947)的《支那史》和桑原鹭藏(1870—1931)的《中等东洋史》等书籍的出版。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又重新为日本所重视。日本的大学历史教学,也在那时开始分成三大块:日本史(又称“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其中东洋史,就是亚洲史,以中国史为主,但也包括中亚甚至西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日本人在观念上“回归”亚洲,并不代表他们想恢复以华夏为中心的亚洲文明。恰恰相反,此时的日本,虎视眈眈,正准备与清朝开战,以图取而代之,在亚洲建立其霸权地位。

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人在甲午战败后的反应。清朝的失败,有点出乎世界的预料,因为不但中国区域辽阔,而且那时的清朝政府,已经开展洋务运动几十年,其国力和兵力都有长足的增强。甲午战败之痛,当然是中国人更为深切。而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则是朝野一致,向日本学习,探究日本迅速崛起的秘诀,于是中国人掀起了留学日本潮。这一潮流的兴起,与政府的鼓励关系甚大。以慈禧为主的清朝政府,仇视百日维新,但却保留了其教育改革的部分,比如京师大学堂就得继续维持。北大的校史也就自1898年始。在这同时,清末还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措施,以“改科举、兴学堂、奖游学”为概括。实行这些措施,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日人不少,之后又配备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国学生辅助教学。这些留日学生出身的教员,年纪常常比学员还轻,不合“先生”的原意,因此造成一定的窘状。^①不过这一情形的造成,正好反映了清朝政府那时从事教育改革的急切愿望。

三

这一急切愿望,在清末新政时期教科书的撰

写和使用上,表现尤为明显。上面提到的日本汉学家所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因为文字相近,甚至有的干脆就用汉文撰写,因此马上便为那时的新式学堂所普遍采用,其中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最为畅销。这一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用吴研因(1886—1975)的话来形容就是:

清朝末年学校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诗》、《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是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而且文字都很艰深,教学时除了死读死背诵之外,也不能让儿童明了到底读的是些什么。^②

从所列书名可见,《史鉴》是一部历史读物,可惜笔者无从见到,但猜测可能是与《十八史略》相似的作品。除了文字也许比较艰深以外,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传统历史读物的最大问题,就是历史观点陈旧,将历史教育与道德教育等同,让前者作为后者的注脚和说明。而那时的人更关心的是在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之后,中国该往何处去。这一关心与传统的治乱兴衰之历史探究,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世界的变局,已经让中国人看到以往的历史思维,不敷需要了。至少,中国人的世界观,已经无法局限在东亚大陆甚至亚洲,而是必须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一个已经由西方人所掌控的世界了。

上面已经提到,在1894年翻译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西方同类著作中,质量不算上乘,以后甚至被20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称之为“最乏味的残余”,但却在甲午战后的中国成了“最风行的读物”之一,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作者在书中大力提倡的历史进步观念。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大力提倡,对已经熟知这一历史观念的英国史家,显得“乏味”,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则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该书的译者李提摩太,久居中国,选择

^① 参见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的境遇》,《清华学报》2013年第3期。

^② 引自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此书翻译,正是因为在他眼里,此书会产生如此效果。他在“译本序”中开宗明义:“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栳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佰所可比而拟也”。这些固然是溢美之词,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进化论在清末的影响力,亦可见这些并非纯粹是夸张之词。而进化论的流行,又与李提摩太在后面所提的事情有关:“中国不愿与外国交,于上天一视同仁之意未有合也,遂屡有弃好寻仇之祸,他国固不得谓为悉合也。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重以前患甫息,后变迭乘而又加甚焉,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呜呼!谁之咎欤,谁之咎欤!”^①这些说法,将中国受列强欺辱,归咎于清朝政府的政策,有待商榷,不过他所描述的情势发展(赔钱割地和战败于日本等),则又大致符合事实。清朝的战败,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大为流行。《泰西新史揽要》出版以后,十分畅销,如果不算翻版和私印的,就销售了三万本,“打破了中国书业史的纪录”。作为一本西方历史读物,这一销售纪录,并不见弱于同时出版的、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书。而严复《天演论》的巨大成功,与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岌岌可危的情势,同样切切相关。^②两书内容相异,《天演论》阐述进化论的概念与理论,《泰西新史揽要》则“载之行事而深切著明”,它们合力将进化论的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心中。胡适之的名字和陈炯明的字“竞存”,都是当时进化论思想影响国人的例证。

日本人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新政期间流行,不但应那时学制改革之急需,也与进化论思想大行其道有关。本文还想进一步提出,这些教科书的流行,不但乘当时历史进化论盛行之风,而且还有助于进化论的思想,普及于中国的年轻一代。与《泰西新史揽要》相比,这些教科书用进化的视

角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更为“深切著明”,因为其描述的对象是中国人熟知的自己的历史。当然,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与麦肯齐大力歌颂西方历史的进化现象相对照,日本人论述中国历史,强调的是其反面,即没有进化的一面。但或许正因为是如此,反而对中国人的刺激更大,因为“此论”出自敌国之口。我们且看一两个例子。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首篇“总论”有三章,是该书提纲挈领之篇。第一章“地理概略”、第二章“人种之别”、第三章“朝家屡易”。其中第三章最值得一提。那珂通世在其中指出:

汉人谈治,必称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谓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虽不尽如汉人所称,而当四邻皆夷之时,汉土独为礼仪之邦,政教风俗,已擅美于东洋,足以观古代开化之一例矣。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凝滞,不复进动,徒反复朝家之废兴而已。……支那建国甚久,成俗极固,其开化之度,亦非四夷之可及,故胡人或能以其武胜汉,而以其文,则必服于汉。虽胡君在上,其国依然汉唐中国也。国民之情态,一定不变,无进无退,恰如在范型之中,此支那开化之所大异于西国也。^③

这一段总结,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自然是那珂通世的进化观点,认为中国是否“开化”,亦即“文明化”(此为civilisation的原意)是考察中国史的要素。第二是按照这样进化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历史在早期文明程度很高,在东洋高人一头,但此后便不复进步。第三是对这一停滞进化的解释。那珂通世指出中国因为开化甚早,基础牢固,所以可以同化外族统治者,但这并不全是好事,因为这样的汉化,造成国民的心态守旧,不思进取。这些论点,出自一个日本学者,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即使现在的中国人听来,都会感觉很不舒服。但这一不舒服,却又正是因为那珂通世所言,不无道理。如果他是一派胡言,听者也就无所谓了。

当然,那珂通世对于中国的看法也非完全负

① 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者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邹振环《〈泰西新史揽要〉——最乏味的残余与最风行的读物》,氏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03页。

③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一,第三章第二十节,东京:中央堂1888—1989年版。

面。用进化论的观点写作历史,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视角。《支那通史》一书,从远古开始一直写到五代,没有元代以后的历史,因此是一部未完成之作。^① 尽管如此,该书概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于四卷,是一部“通史”。对于这一段很长的历史历程,那珂通世认为其中有“治朝”、有“乱世”。具体而言,汉、唐、宋、元、明、清为“隆盛之朝”,前三者为“后三代”,后三者为“近世三代”。^② 现存的《支那通史》,只有四卷,没有元明清的历史。但从那珂通世在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原先准备写到清朝(该书的总目录最后一章为“近世史下,自清世祖始至今”)。这里三个“三代”的划分,印证了他前述中国历史自秦汉以降,“反复朝家之废兴”的说法。中国虽有治世,但总体倾向是循环往复、停滞不前、没有进化。那珂通世将中国史分为三期:上世(唐虞到战国)、中世(秦汉到宋)和近世(元明清)。

那珂通世的历史分期和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其他流行的日本教科书中,也有不少类似的体现。譬如桑原鹭藏的《初等东洋史》和《中等东洋史》,由那珂通世校阅,大致采取了《支那通史》的分期法,只是略作调整,将“上世”“中世”和“近世”改称为“上古”(先秦到秦)“中古”(秦汉到唐末)和“近古”(唐末到明末),再加上“近世”(满清到清末)。桑原鹭藏指出,上古期的东亚,是“汉人种膨胀时代”,到了中古期,成“汉人种优势时代”。不过这种优势,在近古期为蒙古人种所取代,因此是“蒙古人种最盛时代”。近世期则是“欧人东渐时代”。^③ 这些调整,将华夏周边的蒙古和满洲等族的兴起及其与汉人的交涉结合进来,但总体看法依旧,也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虽有曲折,但一路向上,一直到唐,此后就渐渐走下坡路了。与那珂通世相比,桑原鹭藏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更多一层负面,因为他在近古期,以蒙古人为主,不看好宋朝;而在近

世期,又不重视清朝,注重的是欧人在亚洲势力的扩张。桑原的治史,以严谨著称,他在书中少有议论。但他的分期,已经让人看出他对中国史的总体看法。

另一位日本汉学家井上陈政(榎原陈政,1862—1900),在1889年著有《支那历史》一书,其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他认为中国历史在近世停滞不前的观点。井上陈政的历史分期,与那珂通世和桑原鹭藏的方法类似:上世(唐虞到战国)、中世(秦统一到五代末)、下世(宋到明末)和近世(清到清末)。然后井上陈政又对这几个时期的特征,做了一些描述。他指出在上世,“君民共治、上下协和、民俗自由、民智开发,学术技艺发达”。到了中世则走向君主专制,民俗和智能开始出现“迟碍”,学术和技艺也显出“滞涩”。下世的特点则是政治上不思改革,重文轻武,民俗走向柔弱,学术崇尚虚理。总之,中国的历史,逐步走向退化。也许是他曾受业于清朝大学者俞樾(1821—1907),所以井上陈政对清朝的评价比较正面,说它“政略上有进取的倾向,国势上也有强固之势”。^④ 从他写作的年代来看,正是洋务运动的盛期,于是他对清朝还有所看好。但此后甲午战败,井上陈政的这些称赞也就成了空话了。

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日本教科书所表达的对中国史的看法,心情十分复杂,甚至可以“既恨又爱”来形容。他们“恨”的是在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的情形下,那些日本人对中国史演化的归纳,似乎指出了危机的历史原因,显得颇有道理。而他们“爱”的则是这些日本教科书,用简短的篇幅,就归纳出中国史的大势,而且在内容上还明显超越了“一家一姓”、以朝代为宗的“正史”。这一长处,与日本学者采取的章节体裁,显然有关。因为章节体的运用,能跳出一人一事的束缚,根据需

① 日本学者山田利明解释道,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只写到五代,是因为他的写作,主要依赖中国的“正史”,而《元史》和《新元史》之间,孰是孰非未定,为了避免争议,那珂通世也就干脆不写了。氏著《中国学の歩み》,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版,第12—13页。

②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一,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③ 桑原鹭藏《初等东洋史》,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9年版。

④ 井上陈政《支那历史》(出版事项不明,1889,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第9—11页。

要综合多种历史现象而叙述为一体,方便呈现历史的“一线”进步或演化。分析中国历史的大势,似乎特别需要这样的新方式,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不再为一家一姓的王室所左右;中国的救亡,也需要全民族的参与。因此这些日本人所著的历史教科书,一时在清末流传甚广,也获得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的好评。^①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纷纷将这些日本教科书,译成中文(除了《支那通史》以外,其他所举的教科书,均用日文所写),为学校所用。

不过,清末的中国对采取这些日本教科书,还有“恨”的一面,十分不情愿。清朝学部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有关教科书的条例中便规定,可以“暂用日本原书”或“斟酌采用”,但“仍应自行编纂”。^②而那些翻译日书的中国留日学生,虽然热情高涨,但同时又有矛盾的心理。比如将久保天随(久保得二,1875—1937)《东洋通史》译成中文的蔡汇东(1881—1938),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序”中将这些矛盾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吾译《东洋通史》,吾喜喜者,我中国文化之蚤开也。……东洋全面几半为中国之附属物,则中国者,固执东洋文化之牛耳也,天下之喜,孰出于是?吾译《东洋通史》,吾耻耻者,耻我中国无完全之历史也。左迁而外,史书踵出,然大都为一家一人之记簿,或讲干燥无谓之书法,有历史之名,无历史之意义。即尚有可称者,而或则偏于事实,或则偏于制度,总二者而一之,具如炬眼光,察当日情事,以成一完全中国历史者,则吾遍求之而未得也。求完全中国历史未得之中国,而乃得之扶桑三岛。天下之耻,孰大于是?吾译《东洋通史》,吾惧惧者,惧我中国祸患之纷来也。^③

蔡汇东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武昌起义,成为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他在这里所表述的爱恨交加,很能代表当时中国人读到那些日本教科书的

复杂心情。而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又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这一代的中国学人,都深切感觉到传统中国虽然史籍汗牛充栋,但这些史著,并不符合近代社会中历史研究的功用。他们所希望的史书,用蔡汇东的话来说就是应该能总事实与制度于一体,并具有明确的历史观点,综合考察历史的总体走向。这样的史书,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章节体的叙述史体裁。在中国人自己尚未编出章节体史书之前,日本人的作品在那时受到重视,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不过,这只是暂时现象。章节体史书传入中国,日本只是一个中介。如上所言,清朝政府与中国学者,都不满在学制改革之后,中国学校大量采用日本人编写教材的现象。教科书的发行数量之大,也让一些有经商头脑的人士感到有利可图,于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版业蓬勃兴起。比如1897年建立的商务印书馆,最初便以发行教科书为主。通过朝野的共同努力,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在20世纪初年迅速登台,逐渐取代了日本的教科书。就历史教科书而言,由夏曾佑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影响甚大,但还有如汪荣宝、丁宝书等人编写的教材。而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改写和扩充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也颇有销路。夏、曾、刘的教科书,均采用了类似于日本教科书的历史分期(上古、中古、近古等),注重中国历史的整体演变,但都没有从远古一直写到近代,因此它们虽有“通史”的样式,但都是未完成的作品。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在《支那通史》的基础上,补充了明代的历史,因此相对更为完整。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都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融制度、经济、文化和教育于一体,力图勾勒中国文明在历

① 参见前引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71—83页及胡逢祥、张文建合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② 引自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80—81页。

③ 久保天随撰,蔡汇东译《东洋通史》,蔡汇东序,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版,第1—2页。

代的演化轨迹,并提出一些解释和分析。^①于是,中国的历史著述便逐渐走出了司马迁、左丘明和司马光所建立的记述传统,开始走向了新途。同时,借助这些新式教科书的影响力,历史进化观念也得以普及于清末中国的一代学子,并在当代中国,仍有深刻之留痕。^②

Where Is Sima Qian?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Narrative Histor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Q. Edward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long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annals-biographic style (Jizhuanti) created by Sima Qian was used in compiling dynastic histories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s such, Sima Qian continuously received accolades from historians of various dynasties. But few histories are written in the same style toda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re narrative histories as seen in the modern Wes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had to do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the new-style history textbooks from Meiji Japan played in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The author analyzes how the idea of social Darwinism was applied and expounded in narrating Chinese history in these textbooks, which helped the Chinese to realize their country's dire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need to embrace moder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social Darwinism, annals-biographic history, narrative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oder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 管 琴)

-
- 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这些教科书的价值详加讨论。读者或可参见前引李孝迁和胡逢祥、张文建书及 Peter Zarrow, "Discipline and Narrativ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rian Moloughney, Peter Zarrow,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9–208; Q. Edward Wang "Narrating the Nation: Meiji Historiography, New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Disciplinarization of History in China", Brian Moloughney, Peter Zarrow,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103–134.
- ② 举例而言,1990年代的口号“落后是要挨打的”,为国人所熟知,并成为那时以来中国学生学习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其内涵(落后、进化、发展、停滞等概念)便是历史进化论。